

■ 新作聚焦

阿来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

融入旷野 在行走中记录生长的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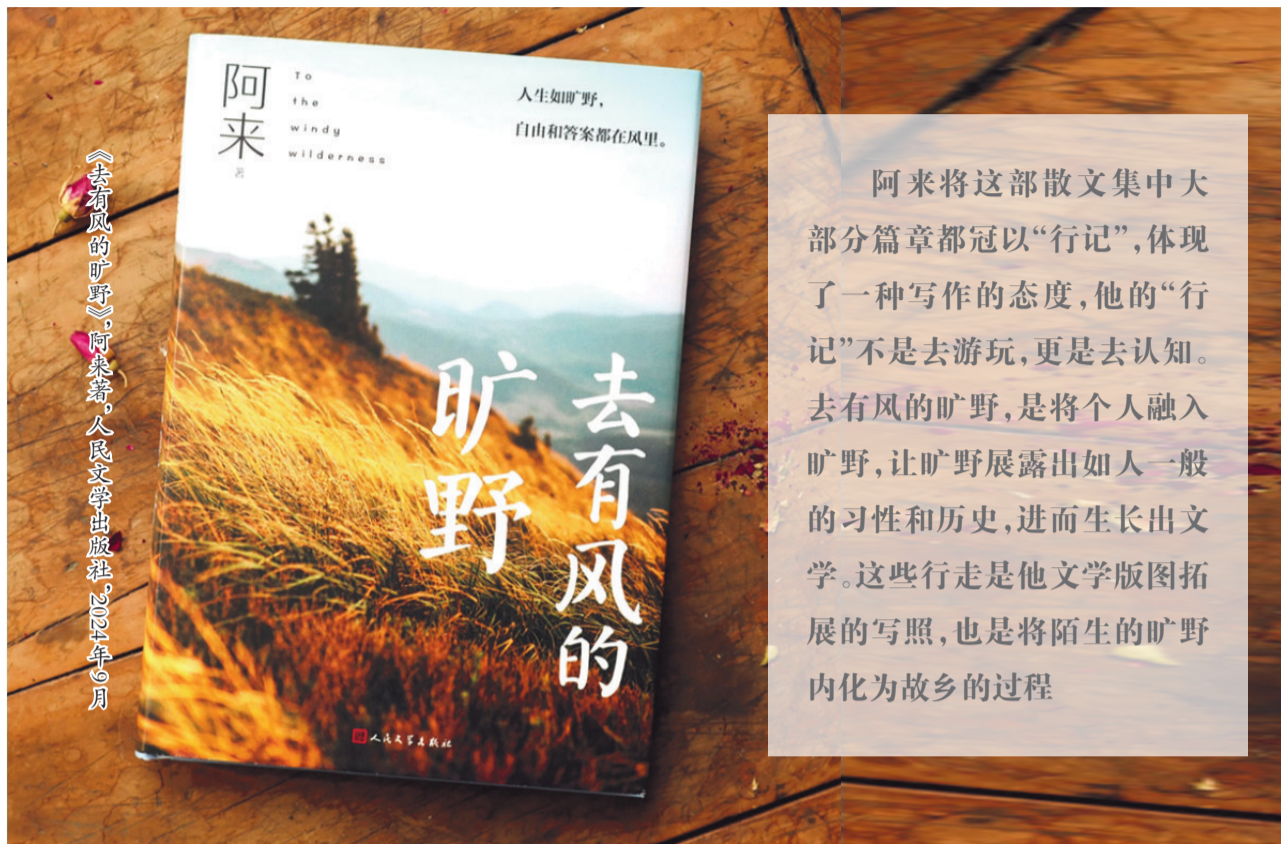
□ 周维东

作家阿来全新推出的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是在各地旅行留下的“行记”。“行记”在中国是个现代事物，底色是科学观念兴起。它与传统“游记”的区别，在于它不仅是人，也是人与地方（自然与人文）情感交流，还包含科学认知的目的。田曙光在《广西旅行记·小引》中谈到“行记”的由来：“感于我国地理教材，记载多不翔实，因决定辞去教职，周游全国乃全世界，站在史、地两种科学之立场，实地考察各地自然状态与人文概况，冀有所得而贡献于社会。”王桐岭在其《陕西旅行记》中也如此讲述“行记”：“历史与地理有密切联系，研究历史而不知地理，则一切史迹无着落。”近代中国史学发生的转变，便是增加了科学的维度，文献与文物、文献与田野的结合打开了史学研究的新视野，也是在这一时期，一系列“行记”勃兴，仅近现代时期成书的“行记”便有近千部之多。

近代中国出现的“行记”，介乎学术与文学之间。大量著者都是史地学家，曾经受过或多或少的学术训练，科学认知的目的也比较强。著作的文学性虽然稍弱，但这并不妨碍文人雅趣，兴致高昂之处，灵光乍现，文字绚丽。当然，写“行记”的也不完全是历史学家，鲁迅、郭沫若、瞿秋白、徐志摩、朱自清，包括曾经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士也都写过，逐渐，“行记”又回归到文学的序列。但是，书写的方式加入了大量近代科学的视角，譬如地貌特征的科学命名、自然动植物的准确名称、人种、民族区分等，甚至于作者也不仅限于“看”，还要“参与”，如此才符合现代行记文学的要求。

阿来将这部散文中大部分篇章都冠以“行记”，体现了一种写作的态度，他的“行记”不是去游玩，更是去认知。《去有风的旷野》是将个人融入旷野，让旷野展露出如人一般的习性和历史，进而生长出文学。读这些“行记”，感受最强烈是阿来的博物和博学，或者说，是他为这些行记所作的准备和积累。阿来几乎能够叫出他所见到的每一种花和大多数植物的名称，熟悉他们的科类和生长特征，进而在遇见时有一种久违的等待感。不必要再去列举阿来对每一种花如爱人般的介绍和描写，仅举一段他对川西高原上四季花色的描写，便能体会这种感觉：“高原秋早，经霜的草梢已经微微泛黄，花的色调变成了蓝色。是的，在草原上，从五月到十月，初春到深秋，旬日之间，就有某几种花开的颜色，成为主调。春天，最初的主调是黄色。这是溪流两岸的湿地中毛茛科的云生毛茛、金莲花率先开放，成片蔓延。高阜浅丘上，也是黄色花星星点点，那是蒲公英、委陵菜和鸭跖草正贴地开放。之后，主调会变成报春花属和马先蒿属的粉红。还有野草莓和草玉梅的白。等等，等等。”（《札谿卡行记》）这已经不是旷野，而是自己的花园，博物学的文学价值，不是让人与物更远，而是更近。与花类似的，还有阿来对于地理、气候等等方面的熟悉，很多专有名词信手拈来，如花一样，有了这些知识的中介，人与大地的距离拉近了，旷野不再陌生。

然而，旷野毕竟是旷野，它可以为人所熟悉，但绝不会完全成为人的花园。正如人无法穷尽对于人性的把握，旷野总是会在你熟悉它的时候，展现出陌生的一面。自然在生长，或者说一切自然中的物，有生命的和没有生命的，都在生长变化之中，这是阿来的发现。在十二背后景区，阿来发现了溶洞生长的秘密：“一切都还在生长，水仍然在地下见缝插针，融通壮大，永不歇停”（《十二背后》），由此他感慨自然的意志：“在人类未出现之前，地球让水如此日复一日创造的意义是什么？那时没有人，是想让谁看见？”在稻城亚丁，阿来为天文台观察站所解释的“宇宙中最微弱的光”触动，能够穿越土层的粒子能为科学家捕捉，而对于普通人，尽管它每一天都在自然界发生，但我们一无所知。这难道不是自然的物在生长？有些生长，是人类经验的复现和演绎。在四姑娘山，阿来在深秋的白桦林中体验



到欧阳修的“四无人声，声在树间”，“一片无声，两片无声，百片千片就有了声，森林浩大连绵，数万片数十万片秋叶同时旋舞，同时降落四野便飒飒然，萧萧然，发出了动人秋声”。（《四姑娘山行记》）欧阳修听到的秋声不是在四姑娘山，但如同一个交响乐团演奏一首世界名曲，四姑娘山的秋叶复现了欧阳修第一次听到的那种感觉，又将四姑娘山独有的感觉注入了秋声。

自然的有些生长，是因为有了人的参与，进而显现出生长的痕迹。在阿来的行记中，徐霞客出现了，洪堡、李希霍芬出现了，欧阳修、杜甫出现了，还有更多的普通人出现了，他们不是旅途的雅趣，而是先行者，是阿来行走的坐标。有了坐标，自然的生长才有迹可循。在米仓山，阿来不仅发现了主峰光雾山之外的美，更惊喜地发现了米仓古道遗迹，在贯穿秦岭与巴岭的峭壁和河床上，一列列石孔和残留的木渣，昭示着古道曾经的荣光，这是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杜甫、元稹曾经走过的古道，也是萧何“截贤”韩信的发生地，如果没有坐标，又怎会完整呈现在世人的眼前？在皮洛，阿来看到青藏高原人类活动时间提前到20万年前的石器，他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些累积的地层中，制造石器的是不是同一群人？不是，远古人类在广阔的世界里来来去去，活动范围远超于我们今天的想象”。（《稻城亚丁行记》）阿来发出感叹的那一刻，自然生长的感觉如画面呈现在眼前，如果有一个足够长足够快速的摄影镜头，我们不仅能看到逐渐升高的青藏高原，还能看到来来去去不同的人类。

《去有风的旷野》是阿来“蓄谋已久”的行走，其中的足迹与阿来的创作轨迹互相呼应，自然生长的背后，是阿来文学版图的不断拓展。

《尘埃落定》之后，阿来又创作了《空山》《格萨尔王》《瞻对》《云中记》《阿来讲杜甫成都诗》等重要作品。如果将《尘埃落定》作为阿来文学版图的原点，此后创作在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有以下特征：西向，从阿坝地区拓展到整个青藏高

原，《格萨尔王》和《瞻对》是典型表征；东向，从少数民族文化区拓展到汉族文化区，《阿来讲杜甫成都诗》等作品是典型表征。内向，从近代历史拓展到文化传统、自然人文，《格萨尔王》《瞻对》等都是典型例子。

这几个向度，在《去有风的旷野》中也体现了出来。阿坝在“四姑娘山”“莫格德哇”“札谿卡”“炉霍”“大凉山”的行走，是“西向”的路径，它是阿来拓展对于本民族文化认知的过程。在《札谿卡行记》中，阿来还特别提到为写《格萨尔王》采风经历；《莫格德哇行记》的写法，也会让人想起《瞻对》，在一个宏大的历史长河中理解民族问题。“十二背后”和“米仓山”的行走则是“东向”。在《十二背后》，阿来不断与徐霞客对话，在《分云拔雾见米仓》，阿来则不断与杜甫、元稹、韩信对话，直到他惊喜地看到了米仓古道。而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则可以看到阿来“内向”的痕迹，从博物学知识，到历史古籍，再到人类学的视野，阿来的视野拓展与知识积累让他更从容地行走在旷野，与自然万物、文化遗迹、熟悉与不熟悉的人进行自由对话。“人生如旷野，自由和答案都在风中”，这是阿来在散文集封面上写下的诗句，如果将它与阿来的创作理念联系起来，不是虚言。

将《去有风的旷野》置于近代以来各种“行记”之中，阿来提供的经验，大概可以用“生长的故乡”来形容。对阿来而言，这些行走是他文学版图拓展的写照，也是将陌生的旷野内化为故乡的过程。阿来散文中提到的地方，虽然有些名字还很陌生，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交通发达、民族融合的今天，它们也都不再是印象中的“边地”或“民族地区”。这难道不是故乡在生长？

生长的故乡，也强化了“行记”的文学属性，它不是冒险和征服的记录，也不是简单的科学认知，而是自我的不断成长。（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以及对痛苦自我消解……我写这本书，更多的是一种追问……人之存在的核心，是否就是“记忆”？这是作家薛舒创作非虚构《远去的人》的初衷。薛舒的父亲晚年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之后漫长而艰难的照顾让一个家庭濒临崩溃。作家记录下这一爱与痛交织的经历，成为无数有此遭遇的家庭的慰藉。对谈中，薛舒既有对文本的阐释与解读，也有对作家心事的关切，自然而然地将问题娓娓道来。“面对面，心对心，性情对性情的直接对话”中，除了你来我往的智性交锋，性情的真实流露、情感的同情共理，才是理解作家、走进作家的绝佳途径，也使文学批评洋溢着一种亲切朴素真实感和生活感。

对话作为一种批评体式，既可以使思想更显豁透彻，也可以使之更活跃生动。薛舒与作家在对话中的观念差异、精神共鸣，不仅栩栩如生地呈现了各自的主体形象，更复现了一种话语交锋的文学现场。与李浩的对话以诗歌为中心，将视野扩展至对时代、社会、思想、人生等问题上，看似即兴畅谈，却能激起电光火石的思想碰撞，体现出同代人的同声共长与相互照亮。

对话鲜活地传达出了作家的创作感受、文学探索。其中流溢的思想碎片，闪烁着微光与智性。批评家金理曾说过，“文学尽管是‘个人的事业’，但同样需要同代人的喂鸣激荡之声，相互应答、分享、承担和创造。”对话展现了可贵的理想批评态度，不仅是接续历史久远的对话传统的重要尝试，也是发掘对话批评现场感和文学性的重要尝试。同代人在思想观点的较量中，相互砥砺、彼此成就，互相瞩望、共同进步，批评家愿为“磨刀石”，虽不从事创作，但能使文学创作的钢刀更为锋利。（作者系保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文学名刊 新作扫描

《钟山》《江南》《山花》《湖南文学》《福建文学》《长江文艺》：重新建构内心的「坚信」

□ 周丽华

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活动的效率和生产力，也不断迭代着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当今，我们都处在罗萨所说的“加速社会”中。在科技飞速进步，智能化时代降临的当下，追问人生的意义已然已经成为现代人最为突出的时代精神之一。人类在运用高科技重建万物的同时，也造出一个“难以驾驭的社会巨机器”。高度虚拟化、网络化的世界成为人类生存的新生态，逐渐影响着人与现实世界的种种连接。在这样的境况下，人类应当何去何从？六大刊物近期刊发的新作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并书写着这一现象，以文学之声集束式地与时代之间同频共振。

《江南》第5期推出的留学生小辑，重在关注现代人精神的惶惑、内心的挣扎与自我认同。其中邵宇翔《法戈》极具典型性。随着人工智能的升级，金天成为一名被优化的硅谷“精英”，随后女友小米也与其分手。设计人工智能的人反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机器淘汰，这是作者颇具意味的安排。金天倾尽所有赴美留学，却在即将跃龙门的当口遭遇冰封，人生奋斗的意义被消解，他陷入巨大的迷茫与无措中。故事的最后，金天放逐了房东的狗——法戈，它奔向自由的身影正是金天内心深处渴望的“现代性”的降临和时空的“脱域”，让社会关系被重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也渐渐增强。

朱朝敏《鲸鱼沉默》（《钟山》第4期）中的子一念深陷婚姻危机中，他对妻子的漠视致使夫妻之间的沟通出现偏差。爱人间的冷漠、疏离和隔膜是一把把被反复打磨的利刃，一旦出鞘，伤人至深，最终凝结成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这种精神创伤在现代家庭的亲子关系中体现得更为沉重。倪苒《像风一样》、殷飞《南方隐尘》（《钟山》第4期），以及赵斐虹《寄居蟹》（《山花》第7期）都叙述了现代社会，孩子与家长因为学业问题而精神上备受折磨的现状。在“成绩”这一单向度的衡量标尺下，教育逐渐偏离了“教书育人”的初心，甚至成为追求效用的工具。《像风一样》中无名的主人公与《寄居蟹》中的陈亦歌都在这种高压下失落了求学最初的快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紧张。在这种单一的指标下，在预定好的轨道里，他们的交友、娱乐需求和心理健康都受到了影响。《像风一样》中那只放不起来的纸飞机，预示着主人公被困住的内心，无名的他正是社会中万万千青少年的象征，在本应健康快乐的青少年时期，他们的内心却被很多不快乐裹挟。同时，家长们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寄居蟹》中的周慧为了孩子心仪的学校，换掉工作，来到完全陌生的环境陪读，失去了“做自己”的自由。《南方隐尘》中的底层女性，同样背井离乡、成为陪读母亲。比周慧更艰辛的是，她们经济拮据。因此在遭遇变故、丈夫失去劳动能力时，为了孩子们教育的继续，她们要付出更多不为人知的艰辛。

在高速运转的时代节奏中，每个人都像是被上了发条的机器。陈亦歌度过青春期后，面临的是更残酷的生存考验。屈越《异客》（《福建文学》第8期）中的张杨，为缓解修改论文的压力前往西藏。赖继《星河坠落》中的唐小楼是典型的“小镇青年”，他曾在笔记本上写下：“城市是座巨大的牢，我们都在试图越狱。”任白衣《许海生的船》（《福建文学》第8期）中的许海生，在充斥着数据、量化的互联网公司中谋生，在24小时待命的高强度工作中患上“晕地综合征”，最终选择离开深圳，回到碣石湾，独自一人海洋中寻找生命的意义。《长江文艺》第9期推出的“科幻文学专辑”系列作品则将许海生这种“原子化的个人”的状态演化得更为具象。万象峰年在《离开历史之人》中设置了一个“私密”装置，人在其间可以靠科技的力量自给自足，不需要与他者产生联系。梁宝星的《巴比伦铁塔》中讲述的是战后机器人求生的故事，本质上也是影射着人类的命运。《湖南文学》第8期也关注着这一话题。王威廉《荒岛朋克》中的穿越者赵栋在穿到新未来之后，却在无宇宙的后人类境况下，更为深入地思考关于自我认同的严肃问题。前任人工智能无法控制的荒岛成为他新的执念，最终他变成了一只海胆，重新获得了与大地和宇宙的连接。《荒岛朋克》可视为一则指涉着人类何去何从的未来式寓言。关于如何让赵栋重拾精神寄托，王威廉给出的药方是让他触摸真实，重新在一个有实感、具体性、确定性的世界中感知自我。

在世界的多元文化中，重铸内心的“坚信”，是现代人的精神自救的救赎之道。林晓哲《缓慢生长》（《江南》第4期）、许玲《地下生长》（《江南》第5期）正是秉持这种坚信的范本。支撑着林德成和赵中铎这对夫妻在历经战争的动荡、改革的波澜、市场的沉浮后还能够把生活过得愈发红火、有滋有味，让维权老人江月娥和艰难度日的小夏能够愈合创伤、滋养新绿洲的，正是他们对孝与爱的坚信。这种信念给了他们向上稳稳扎根，他们缓慢生长的力量，他们勤恳而朴实地着眼于当下实实在在的生活，不去设想太多漂浮于“附近”之外的虚空，反而于无意中获得了形而上的精神滋养。

在这样一个“快”时代，汲取《缓慢生长》中那股“慢”下来的力量，或许才能增强人内心的弹性与韧性，让我们重建自我与他者的联结，重建与“附近”之间毛茸茸的生活质感，重新体会人性本真的美好。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那样，在共同体的合力中寻找不确定性世界中的安全感，因为个人主体的意义正是在与周围事物的相互开放、彼此承认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确认。当下，重新建构起值得坚信的意义和价值，显得尤为重要。毕竟在值得坚信“框架”中，人才得以安顿自身。这不仅是现代人走出精神困顿的救赎之道，也是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的必然指向。（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 短评

同代人的同声共长

——评杪楞《把最好的部分给这个世界——“70后”文学对话录》

□ 翟晓菲

又显朴素悠长。

在一段时间内，“70后”作家的群体面貌曾经一度是比较模糊晦暗的。作为“70后”作家的同行者、观察者，杪楞与作家的对话更亲切、从容、自然、深入。一代作家在共同的时代体验中，既汲取着时代巨浪细波馈赠的叙事资源，也创造着各自美学追求的异质与斑斓。比如，他们在领受先锋精神的同时自觉融入人间日常，并以各自的探索性写作暗合当代中国的变化与流向。比如，同是书写弱势群体，肖江虹意在“表达人类基本的尊严”，薛舒“企图走进事实以外的精神真相”，黄咏梅则“喜欢写虚弱的心”。这种依凭内部省思的写作，已经成为时代的珍贵证言。对话录鲜活而诚挚地呈现出“70后”作家创作过程中的心路历程、生活情状和精神脉络，梳理出具有独特经验和文学价值的个人史，并以代际群体的面貌展示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轨迹，丰富、深化着文学史的构建。

以扎实学养和理性态度客观地剖析作家、慎重地评价作品，是评论家真诚可贵的品行。在对谈中，除却严苛的作品审视和直击本质的提问外，还涓涓流淌着杪楞待人接物的温润体贴和对作家创作的体恤。在“喂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对话氛围中，作家敞开了心扉：鲁敏发出“谁都是风里雨里不一样的树叶”的感慨；薛舒坚持“给出自己最好的部分”的仁爱；肖江虹对万物平等的透彻认知；陈集益对自我个体与时代经验联系的自觉意识；杨献平对历史和故乡的重新发掘……平易亲和又不至于无聊的对谈与讲述，令这部访谈录弥散着情谊的温暖与清谈的机锋，也构成了“70后”作家文学叙述的河流，在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下，杪楞抵达了作家创作的初心和旷野。“我写《远去的人》，起初也只是对这种遭遇的情绪宣泄，

以及对痛苦自我消解……我写这本书，更多的是一种追问……人之存在的核心，是否就是“记忆”？这是作家薛舒创作非虚构《远去的人》的初衷。薛舒的父亲晚年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之后漫长而艰难的照顾让一个家庭濒临崩溃。作家记录下这一爱与痛交织的经历，成为无数有此遭遇的家庭的慰藉。对谈中，薛舒既有对文本的阐释与解读，也有对作家心事的关切，自然而然地将问题娓娓道来。“面对面，心对心，性情对性情的直接对话”中，除了你来我往的智性交锋，性情的真实流露、情感的同情共理，才是理解作家、走进作家的绝佳途径，也使文学批评洋溢着一种亲切朴素真实感和生活感。

对话作为一种批评体式，既可以使思想更显豁透彻，也可以使之更活跃生动。薛舒与作家在对话中的观念差异、精神共鸣，不仅栩栩如生地呈现了各自的主体形象，更复现了一种话语交锋的文学现场。与李浩的对话以诗歌为中心，将视野扩展至对时代、社会、思想、人生等问题上，看似即兴畅谈，却能激起电光火石的思想碰撞，体现出同代人的同声共长与相互照亮。

对话鲜活地传达出了作家的创作感受、文学探索。其中流溢的思想碎片，闪烁着微光与智性。批评家金理曾说过，“文学尽管是‘个人的事业’，但同样需要同代人的喂鸣激荡之声，相互应答、分享、承担和创造。”对话展现了可贵的理想批评态度，不仅是接续历史久远的对话传统的重要尝试，也是发掘对话批评现场感和文学性的重要尝试。同代人在思想观点的较量中，相互砥砺、彼此成就，互相瞩望、共同进步，批评家愿为“磨刀石”，虽不从事创作，但能使文学创作的钢刀更为锋利。（作者系保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把最好的部分给这个世界——“70后”文学对话录》，杪楞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24年7月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70后”作家经历了中国全方位的变革，纷繁的变迁和涌动的思潮使其创作呈现出沉郁深邃的气质，其在为行进中的“中国故事”提供了重要的文学经验的同时，也逐渐显示出各自的文本特性和艺术风貌，成为当代文坛的中坚力量。《把最好的部分给这个世界——“70后”文学对话录》以诚挚而温暖的友人漫谈、智性而犀利的文学对话，刻画下深情而不张扬、理性但不高蹈的作家画像，呈现出当代作家的文学世界和文学追求。作者杪楞以同代人的共感和批评家的眼光，与鲁敏、薛舒、黄咏梅、王小王、张好好、张楚、东君、哲贵、肖江虹、曹寇、陈集益、王十月、杨献平、李浩展开文学对话，通过回溯创作历程、梳理创作成果、阐释具体文本、聚焦文学现场，记录下“70后”作家向着繁茂的文学星空挥笔不辍的文学生活，既有思想锋芒，